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1. “两型”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是当前我国发展的重大战略之一

21 世纪以来,为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日益加剧的矛盾,党和国家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确立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党中央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两型”社会,并首次明确将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把建设“两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也提出将建设“两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建设“两型”社会成为国家重要发展战略。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明确要求确保到 2020 年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要成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从现实情况看,尽管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前列,但区域经济发展

不均衡的问题十分突出。党中央、国务院针对中部六省发展相对缓慢的状况，出台了《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把中部建成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以及综合交通运输枢纽。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环境的约束越来越突出，中部地区作为国家重要的资源能源产出地区，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更加凸显。

2007年12月，长沙、株洲、湘潭（长株潭）城市群被批准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视察时指出，希望湖南发挥作为东部沿海地区 and 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一带一部）的区位优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努力走出一条结构合理、方式优化、区域协调、城乡一体的发展新路，为推动全国体制改革、促进生态文明、实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可见，建设“两型”社会与生态文明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实现美丽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2. “两型”产业集群的发展是“两型”社会建设的关键所在

产业集群是产业集聚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产物，而“两型”产业的发展则是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的核心内容。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产业集群所起到的作用绝对不容小觑。从东部沿海到中西部地区、从城市到乡镇、从高新技术行业到初级制造业，都分布着各种形式的产业集群，区域经济对产业集群发展的依赖则更大。同时，我国的产业集群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解决劳动力就业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产业集群也成为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国家致力于通过政府的组织引导、集群的科学规划和产业链的协同发展，促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实行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认定，提升产业竞争力。

根据“两型”社会建设要求，湖南省于2011年发布了“两型”产业、“两型”企业、“两型”园区、“两型”县、“两型”镇、“两型”农村等6个类别的试行标准。其中，“两型”产业被列为“两型”社会建设战略中的首位，它是指以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为发展目标，以环保、低消耗、循环

型、高科技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产业，主要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文化创意产业、现代服务业等。2013年6月，北京中关村移动互联网等10个产业集群被认定为第一批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①。

“两型”产业集群是符合“两型”标准的产业在空间和地理上的集聚而形成的集群，其发展更是“两型”社会建设的有力支撑和关键路径。一方面，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竞争力水平的重要指标，“两型”产业集群本身的规模效应和聚合效应会对区域经济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可有效整合集群内的资源要素，节约交易费用，降低企业成本，大大提高公共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并减少重复建设，增强外部经济效应和持续创新效应，形成有效竞争机制，提高资源利用率，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促进“两型”社会建设。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背景下，产业集群不仅构成当今世界区域经济的基本空间构架和重要组织形式，而且还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优化经济结构和提升区域竞争优势之关键。“两型”产业集群发展对整合资源要素、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提升地区经济地位进而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等方面将产生令世人瞩目的影响。

3. “两型”产业集群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大力支持

首先，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提升经济实力要靠金融来支撑。历史发展经验表明，金融的发展规模和活跃程度，决定着一个地方的经济实力和水平，金融规模扩大与经济总量提升的相关性非常显著。

其次，产业层次的提升依赖于金融支持。金融业是为其他产业服务的产业，金融机构是为其他企业服务的企业。无论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是大力发展现代工业，都需要金融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金融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中居于重要地位，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殊作用。

再次，“两型”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无法脱离金融的有效支持。一方面，资金是保证集群企业得以维持基本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基本要素之一，

^① 根据《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3〕230号）创新型产业集群是指产业链相关企业、研发和服务机构在特定区域集聚，通过分工合作和协同创新，形成具有跨行业跨区域带动作用和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组织形态。

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张必然要求资金流通的顺畅,“两型”产业集群的发展更滋生了大规模的资金需求,金融体系可为区域内“两型”产业集聚形成产业集群提供丰富的融资渠道,从而助力产业集群的形成。另一方面,发达的金融体系有助于吸收优质资本进入产业集群,解决研发经费短缺、研发成果转化缓慢等问题^①,可以完善产业集群内部的技术网络系统,促进集群内的技术扩散。另外,金融体系通过对金融资源的整合与引导,可以有效促进“两型”企业的集聚与“两型”产业的形成,提高集群组织化程度,协助“两型”产业集群良性发展。

最后,良好的外部金融环境对“两型”产业集群的发展与升级有较大的影响,尤其是完善的区域金融结构与金融制度。区域金融状况决定区域金融资源在区域内不同产业及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配置结构,进而决定不同经济部门的金融资源配置数量,影响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

正是基于上述背景,作为“两型”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两型”产业集群的发展问题正受到日益广泛的关注,要保障“两型”产业集群稳健成长与壮大,有效的金融支持必不可少,因此,对金融如何有效支持“两型”产业集群发展的问题进行系统探讨,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

1.1.2 研究意义

长株潭地区是湖南省区域经济的中心,自2007年底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批以来,经过6年多的建设,该试验区完成了“两型”社会建设的顶层设计,初步建立了“两型”社会建设的政策法规和体制机制,形成了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打造了一个引领湖南省科学发展的强力引擎。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为全国处理经济建设、人口增长、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之间关系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因此,以湖南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建设为出发点,研究此背景下“两型”产业集群发展的金融支持,有助于为未来“两型”产业集群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① 谷任,邝国良.产业集群、金融发展与产业竞争力[J].中国软科学,2007(6):92-95.

目前,长株潭试验区的金融市场尚不完善,金融机构体系不够健全、融资渠道单一等问题是限制“两型”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瓶颈。鉴于此,本书试图研究以下问题:(1)区域金融结构对“两型”产业集群的影响如何?(2)金融支持对现有“两型”产业集群发展的贡献力度有多大?(3)如何有效地利用金融支持引导“两型”产业集群发展?以上理论命题的构建及相应问题的解决正是本书的理论意义所在。

本书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通过剖析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中金融支持对“两型”产业集群发展的实际作用,探讨金融支持与“两型”产业集群发展的内在互动机理。研究能有效促进“两型”产业集群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以及利用金融支持促进“两型”产业集群生态化发展与升级,为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改革试验区产业建设及金融发展的政策调整提供决策参考和选择依据,同时也为未来其他地区“两型”社会及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本书重点对国内外学者关于产业集群发展、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及产业集群的关系、产业集群发展的金融支持以及“两型”社会金融支持等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和系统梳理。

1.2.1 关于产业集群的研究

1. 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

产业集群的思想最早是由马歇尔(Marshall)于1890年提出的,他将基于外部经济的驱动而在同一区位集聚的企业集群称之为“产业区”。随后,在马歇尔思想的基础上,韦伯(Weber, 1929)进而提出“聚集经济”的概念,提出地理位置上的邻近导致聚集的企业群充分享受聚集的经济效应^①。其后,克鲁格曼(Krugman, 1991)进一步分析指出产业集群形成的原因在于集聚的

^① Weber Alfred. Theory of the location of industries [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9.

企业由于位于同一地理区域内而产生了密切的经济联系^①。波特（Porter, 1998）则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对产业集群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拓展研究，并将其定义为：在地理位置上高度集中，并且相互联系的企业总和，不仅包括这些彼此联系的企业，而且包含相关的辅助性产品、技术和服务的提供者，以及相关的销售渠道和最终客户^②。产业集群是实现企业自身竞争优势一个重要途径。马歇尔（Marshall, 1920）分析认为产业集群有至少三方面的优势（正外部性）：更容易进入市场，供应商和劳动力的获取以及技术的相互流通^③；同时，格莱泽和戈特利布（Glaeser and Gottlieb, 2009）指出产业集聚还具有加速思想流动的作用^④。

集群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亨德森·弗农等（Henderson Vernon et al., 2000）从经济发展和地理的视角出发，探讨了产业集群的形成以及脱离集群的后果等问题，并对国际经济的地理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⑤。Fornahl and Menzel (2003) 从企业技术异质性的研究角度解释了集群萌芽、成长、衰退及复兴的动态过程^⑥。Li (2012) 用集群进化三极模型分析了集群的演进过程^⑦。

国内部分学者也对产业集群的形成、成长及其动力机制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如惠宁（2006）提出产业集群的形成是专业化分工导致边际报酬递增的空间表现形式，进而指出深化分工是产业集群成长的内在机理^⑧。芦彩梅和梁嘉骅（2009）认为产业集群的演化动力是竞争合作协同，通过协同演化

① Krugman Paul. History and industry location: the case of the manufacturing belt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1, 81 (81): 80-83.

② Porter M E. Clusters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 [M].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8, 76 (6): 77-90.

③ Marshall, A.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M].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20.

④ Edward L. Glaeser, Joshua D. Gottlieb. The wealth of cities: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spatial equilibrium in the United States [J]. NBER Working Paper No. 14806 Issued in March 2009.

⑤ Henderson J. Vernon, Shalizi Zmarak, Venables Anthony J. Geography and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1, 1 (1): 81-105.

⑥ Fornahl D, Menzel M P. Co-development of firm foundations and regional clusters [J]. Hannover Economic Papers, 2003, 71 (1): 1-33.

⑦ Li P F, Bathelt H, Wang J. Network dynamics and cluster evolution: changing trajectories of the aluminium extrusion industry in Dali, China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1, 12 (1): 127-155.

⑧ 惠宁. 分工深化促使产业集群成长的机理研究 [J]. 经济学家, 2006 (1): 108-114.

可以促进双方效率的不断提高,实现集群整体的最优资源配置,并建立了产业集群协同演化动力学模型,以中山小榄镇五金集群为例进行了研究^①。刘国宜等(2013)在对各种集聚理论进行整合的基础上提出政府促导、区域创新环境、外部经济和社会网络根植是产业集群形成的四大动力来源,其中社会网络根植提供内部动力,外部经济是集群的源动力,创新环境和政府促导提供外部动力^②。陆文聪等(2013)以知识密集型产业集群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基于人力资本积聚的集群发展动力机制模型,并用以揭示知识密集型产业集群发展动力的构成要素与作用机制^③。沈小平等(2014)提出创新型产业集群是产业集群的高级形态,并分析了影响其形成的因素和作用机制^④。

2. 产业集群的类型与经济效应

根据不同的研究角度和分类方式,产业集群可分为不同的类型。如 Hertog (1999) 基于“群”的概念将产业集群分为微观层(企业群)、中观群(产业集群)和宏观群,群内企业通常通过创新链和产品链进行连接^⑤。Mytelka 和 Farinelli (2000) 从组织和职能的角度将产业集群分为非正式群、有组织群和创新群,并探讨了如何在传统产业中培育创新群、建立创新系统,从而使传统产业保持可持续的竞争优势^⑥。国内学者吴德进(2004)分析认为产业集群是一种中间性体制组织,企业间交易的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的不同匹配决定了产业集群组织存在的效率边界,从不同的角度看产业集群具有不同的组织内涵^⑦。

关于产业集群的成长周期,学者们的划分大同小异。Tichy (1998) 基于

① 芦彩梅,梁嘉骅.产业集群协同演化模型及案例分析——以中山小榄镇五金集群为例[J].中国软科学,2009(2):142-151.

② 刘国宜,胡振华,易经章.产业集群的动力来源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13(3):167-169.

③ 陆文聪,胡雷芳,祁慧博.知识密集型产业集群发展动力机制模型构建——基于人力资本集聚的视角[J].科技进步与决策,2013,30(3),65-68.

④ 沈小平,李传福.创新型产业集群形成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J].科技管理研究,2014(14):144-147.

⑤ Den Hertog P, Leyten J, Limpens I, et al. Approaches to cluster analysis and its rationale as a basis of policy [J]. University of Brighton, 1999.

⑥ Lynn Mytelka, Fulvia Farinelli. Local clusters, innovation system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ness [J]. INTECH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2000.

⑦ 吴德进.产业集群的组织性质:属性与内涵[J].中国工业经济,2004(7):14-20.

时间维度对产业集群的成长周期进行了划分,包括诞生、成长、成熟、衰退四个阶段^①;波特(Porter, 1998)总结出产业集群要经历萌芽、演进、衰退三个过程,认为产业集群丧失竞争力是因为技术中断、需求变化和集群内在的僵化^②。刘天卓(2006)从生态学的视角提出产业集群具有和生物种群类似的结构、行为和特征,并从制度化、社会网络和路径依赖三个方面考察了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的阶段化特征^③。

此外,还有学者对不同产业集群类型进行了对比,曹丽莉(2008)从内在供应链“子网络”的形态、网络组织化程度和创新能力三个方面对市场型产业集群和中卫型产业集群两种最基本的集群网络结构进行了对比,认为中卫型产业集群网络内部具有更强的不断调整、协同、创新、升级的能力^④。李琳等(2013)实证发现我国国家级软件园区的地理邻近对软件集群创新影响呈S型阶段特征,区间地理邻近对创新影响呈边际报酬递减的正效应^⑤。

产业集群对产业升级、创新和就业等方面的积极影响得到了许多实证研究的支持。Hsieh 和 Li (2009)通过对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省深海水产业的集群化对当地商业化的影响,以及与经济、社会、技术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个无边界集群内部的产学研三阶段螺旋模型^⑥。Long 和 Zhang (2011)认为在金融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优势在于能够减轻企业的金融约束^⑦。Martin 和 Ottaviano (2001)建立了经济增长与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的自我强化模型,证明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降低了创新成本,刺激了经济增长;同时还符合缪尔达尔的“循环与因果积累理论”,即市场规模较大地区的

① Tichy G. Clusters; less dispensable and more risky than ever [J]. Clusters and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1998; 211-25.

② Porter M E. Clusters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 [M].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8, 76 (6): 77-90.

③ 刘天卓. 产业集群的生态属性与阶段化特征研究 [D]. 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06.

④ 曹丽莉.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的比较研究 [J]. 中国工业经济, 2008 (8): 143-152.

⑤ 李琳, 韩宝龙, 高攀. 地理邻近对产业集群创新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 [J]. 中国软科学, 2013 (1): 167-175.

⑥ Pi-feng Hsieh, Yan-Ru Li. A cluster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ep ocean water industry [J]. 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 2009, 52 (6): 287-293.

⑦ Chery Long, Xiaobo Zhang. Cluster-based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financing and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1, 84, (1): 112-123.

向心力作用使新企业倾向于选址在该集聚区域,市场的扩大与地区企业数量相关,而经济增长进一步推动了空间的集聚^①。Ciccone 和 Hall (1993)^②, Ciccone (2002) 的实证研究显示,美国和欧洲的产业积聚与当地的生产力水平呈正相关^③。Beaudry 和 Swann (2001) 基于对英国产业集群的实证研究发现:不同行业类型的产业集群的集聚强度对集群内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的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汽车、航空、计算机以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等类型的产业集群存在较强的正效应^④。赵波 (2011) 以佛山、夹江等地的陶瓷产业集群为例,实证发现产业集聚性对集群创新绩效具有较强的正向作用^⑤。

3. 产业集群低碳化

基于以上综述发现,国外学者已经从多角度研究了产业集群并形成了丰富的成果,近年来也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生态产业集群,但具体研究低碳产业集群的却很少有,基本都是关注低碳产业发展方面等内容,大多是从宏观层面来研究低碳经济,主要从政府宏观引导和技术创新等方面提出实现产业低碳发展的政策。如 Kuri (2005) 分析指出低碳产业的发展有赖于对新能源的开发利用以及对低碳技术的高度重视,必须通过开发新能源,高度重视低碳技术创新来发展低碳产业^⑥。Clarke (2010) 则强调发展低碳经济的重点在于人才战略,如致力于从事高技术研究的工程师等^⑦。

Hartman (2003) 和 Dagoumas et al (2010) 以英国的低碳产业为研究对

① Martin P, Ottaviano G I P. Growth and agglomeration [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001, 42 (4): 947-968.

② Ciccone A, Hall R E. Productivity and the density of economic activity [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93.

③ Antonio Ciccone. Agglomeration effects in Europe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2, 46 (2): 213-227.

④ Catherine Beaudry, Peter Swann. Growth in industrial clusters: a bird's eye view of the United Kingdom [J]. SIEPR Discussion Paper No. 00-38, 2001.

⑤ 赵波,张惠琴,李梨花.西部瓷都陶瓷产业集群内企业自适应行为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1 (18): 186-188.

⑥ Kuri B., Li F. Valuing emissions from electricity towards a low carbon economy [J]. Power Engineering Society General Meeting, IEEE, 2005, (1): 53-59.

⑦ B. Clarke. Briefing: carbon critical design [J]. Proceedings of the ICE- Engineering Sustainability, 2010, 163 (2): 57-59.

象,前者分析了英国应如何制定宏观政策来促进低碳产业的发展^①,后者提出了一个以“能源—经济—环境”为整体框架的一体化发展的 E3MG 的模型,进而构建了英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宏观发展框架^②。Gomi et al (2010) 以日本的低碳经济产业为研究对象,指出其发展的关键点在于提出合理的发展规划,并建立了一个城市低碳发展标准模型^③。Nader (2009) 基于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玛斯达尔的研究,重点分析了低碳产业发展的具体路径,认为政府的指导作用至关重要^④。Shukla et al (2010) 通过对印度低碳产业和低碳经济的现状分析,指出该国应积极向英国、美国等国学习和引进更为先进和成熟的低碳技术^⑤。Philippe martin 等 (2011) 强调了政府在集群生态化过程中的作用,指出应通过建立政府与集群企业间的合作平台,有效结合产业需求研究公共政策,以最终转化为创新成果^⑥。

国内学者关于“两型”产业集群和低碳产业集群的研究较少且主要为定性研究,如伍博超和朱方明 (2011) 通过分析长株潭城市群现阶段“两型”产业集群建设面临的问题,对推进长株潭城市群“两型”产业集群发展进行系统性战略思考^⑦;王欢芳 (2013) 对我国产业集群低碳发展水平及升级模式进行了系统研究^⑧;袁灵和王朝阳 (2013) 运用所建立的资源型产业集群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澳大利亚、中国、美国、韩国、南非五国 2009 年的资源

① Julie Hartman. Energy: U. K. report outlines policy for low-carbon economy [R]. Civil Engineering-ASCE, 2003, 73 (4): 27.

② A. S. Dagoumas, T. S. Barker. Pathways to a low-carbon economy for the UK with the macro-economic E3MG model [J]. Energy Policy, 2010, 38 (6): 3067-3077.

③ Kei Gomi, Kouji Shimada, Yuzuru Matsuoka. A low-carbon scenario creation method for a local-scale econom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Kyoto city [J]. Energy Policy, 2010, 38 (9): 4783-4796.

④ Sam Nader. Paths to a low-carbon economy—The Masdar example [J]. Energy Procedia, 2009, 1 (1): 3951-3958.

⑤ Shukla P R, Dhar S, Fujino J. Renewable energy and low carbon economy transition in India [J]. Journal of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2010, 2 (3): 031005.

⑥ Philippe Martin, Thierry Mayer, Florian Mayneris. Public support to clusters: a firm level study of French “local productive systems” [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11, 41 (2): 108-123.

⑦ 伍博超,朱方明.长株潭城市群“两型”产业集群发展战略思考[J].求索,2011(4): 46-50.

⑧ 王欢芳.我国产业集群低碳发展水平及升级模式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12.

型产业集群水平发展状况进行了评估^①。

关于产业集群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国内学者暨雪吟(2013)总结了产业集群的发展特征和世界主要国家的产业集群实践^②。黄晓和胡汉辉(2013)认为产业集群的新形态是创新集群,产业集群升级发展的新方向是集群转移,这将成为产业集群未来研究的重要分支^③。

1.2.2 关于产业集群发展的金融支持的研究

1. 金融发展与产业集群相互促进

一方面,金融发展有效促进了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产业集群的根植性使得群内企业在信用上要比群外企业更具融资优势,从金融生态的角度反映了金融服务业对产业集群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Fabiani, 2000)^④。同时,产业集群内部企业通过频繁的沟通、协调,必定能与集群内的顾客和供应商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从而降低了企业之间的交易费用,减轻金融负担(Ruan, Zhang, 2009)^⑤。

张荣刚和梁琦(2007)研究认为金融业可以通过内部催化、内外搭桥、外部修正等途径有效促使产业集群的良好发展,同时指出集群内的中小企业能够获取相对较为充分的金融支持^⑥。张小蒂和王永齐(2009)基于对金融支持与产业集群发展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在金融市场效率较高的地区,产业集聚的效果更加明显,并分析原因可能在于银行之间更为充分的竞争、私有经济部门获得更多的金融支持、更高的储蓄投资转化率等^⑦。冉光和

① 袁灵,王朝阳.资源型产业集群水平的经验数据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3(5):93-95.

② 暨雪吟.国外产业集群的实践与借鉴[J].宏观经济管理,2013(9):90-91.

③ 黄晓,胡汉辉.产业集群问题最新研究评述与未来展望[J].软科学,2013,27(1):5-9.

④ S Fabiani, G Pellegrini, E Romagnano, L F Signorini. Efficiency and localization: the case of italian districts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industrial districts [M]. Germany: CUHK Libraries, 2000.

⑤ Jiangqing Ruan, Xiaobo Zhang. Finance and cluster-bas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09, 58(1): 143-164.

⑥ 张荣刚,梁琦.产业集群内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实证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7(01):135-136.

⑦ 张小蒂,王永齐.融资成本、企业家形成与内生产业集聚:一般分析框架及基于中国不同区域的比较分析[J].世界经济,2009(9):15-26.

(2011)认为产业集群的发展需要金融部门强力的支持,通过对西部地区的四川省、陕西省和重庆市等三省市的数据分析发现,金融中介、金融发展效率、融资结构对集群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①。郭岩岩、张婷(2013)实证研究了北京、苏州、重庆、武汉、长沙、西安等我国6个代表性城市的金融支持产业集群发展的具体作用,结论显示金融支持对产业集群发展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②。

另一方面,产业集群也会反过来促进金融发展。魏守华和刘光海(2002)的研究表明集群内中小企业由于集聚于一处的特性,在间接融资方面具有减少信息不对称、减少交易成本等优势,可以得到银行的更多信贷支持^③。钱志新(2005)分析指出由于地理位置上的邻近和集聚,产业集群内部的企业不仅可以共享各种公共基础设施,而且可以分享包括金融资源在内的多种资源^④。刘红(2012)提出产业聚集的外部效应能优化集群所在地的金融生态,集群内企业的根植性推进了注重信用的地域根植,提供良好的金融文化;为集群内企业全方位提供金融服务能减少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进一步优化金融生态,促进金融聚集^⑤。李秀茹(2013)以CBD金融聚集为研究对象,实证发现CBD金融聚集与产业集群发展存在动态的共轭关系,两者之中任一方的发展变化都将通过一系列相互促进相互制衡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对方,既要求对方与其协调发展,产生拉动效应,而且还从多方面驱动对方发展变化,产生推动效应^⑥。同时,金融结构会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变而进化,因为不断变化的产业和经济结构往往会伴随着企业制度创新、市场规模扩大及复杂化,必然扩大对复杂、完善、全面的金融服务的需求。此外,金

① 冉光和,吴昊,邵腾伟.金融支持与产业集群发展:西部三省(市)的经验证据[J].广东社会科学,2011(3):34-41.

② 郭岩岩,张婷.我国金融支持与产业集群发展的相关性研究——基于6省市的面板数据分析[J].价值工程,2013(7):149-150.

③ 魏守华,刘光海.产业集群内中小企业间接融资特点及策略研究[J].财经研究,2002(9):53-59.

④ 钱志新.产业集群的理论与实践:基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⑤ 刘红.上海金融中心建设与区域产业集聚[J].新金融,2012(4):29-34.

⑥ 李秀茹.CBD金融聚集与产业集群共轭效应互动发展问题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13(10):63-69.

融发展还能通过影响企业外部融资成本,对产业成长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产业在成长过程中对外部融资的依赖程度越大,金融发展对其促进作用越大。因而,对外部融资具有很大依赖程度的产业在金融体系发达的国家成长速度很快,而不同行业的企业在银行信贷和股票融资等外源融资方式之间的选择决定了企业不同的融资结构,进而影响金融结构与发展。

2. 金融支持产业集群发展

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在于产业发展,而金融发展的落脚点也应基于产业发展,衡量金融改革与创新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正是在于是否有利于产业的升级与发展(刘世锦,1996)^①。国内诸多学者为产业集群发展构建金融支持体系进行了丰富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

在理论研究方面,程学童(2005)认为应从建立完善民营企业融资的政策环境、完善间接融资体系、开拓直接融资等方面着手解决集群内民营企业融资问题^②;钱水土和翁磊(2009)基于对浙江民营经济的实证研究,发现较之于正规金融,该地区内的非正规金融在解决产业集群内的企业融资需求上的表现更为有效,据此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例如,大力发展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及其他中小金融机构,加大以个体私营企业贷款为主的短期贷款力度,坚持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引进外资,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③。

在实证研究方面,范剑勇(2005)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下,通过对中国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差异分析发现,产业集聚导致了东部制造业的高产值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在该地区的集聚,这些要素集聚正是产业集聚的主要内在动力^④。钱水土、江乐(2009)基于对浙江产业集聚的实证研究发现,以个体私营为主的短期贷款模式和外商直接投资有效促进了该地区的产业集聚,而高集中度的银行业以及过强的政府干预则产生了不利作用^⑤。卢亚娟、

① 刘世锦.为产业升级和发展创造有利的金融环境[J].上海金融,1996(4):31-46.

② 程学童.集群式民营企业成长模式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③ 钱水土,翁磊.社会资本、非正规金融与产业集群发展——浙江经验研究[J].金融研究,2009(11):194-206.

④ 范剑勇.市场一体化,地区专业化与产业集聚趋势——兼谈对地区差距的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05(6):39-51.

⑤ 钱水土,江乐.浙江区域金融结构对产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9,26(10):62-67.

褚保金(2011)建立了一个集群企业融资机制演变四阶段模型,并选取了相对成熟的产业集群进行过实证,指出在不同企业规模与集群环境的组合状态下,集群企业的融资模式各不相同。当规模较小而集群环境封闭时,集群企业主要依靠非正规金融融资;而当企业规模扩大且集群环境开放时,集群企业融资模式转变为正规金融^①。

此外,还有学者对如何建立支持产业集群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如关里(2009)提出建立信用担保体系为集群中小企业融资创造符合要求的融资条件是推进中小企业集群融资的重要保障^②。阚景阳和张运鹏(2010)提出各级地方政府应通过强化金融体系建设、降低金融市场准入门槛以增加金融市场主体、发展多元化的金融机构、积极创新融资模式、打造产业集群融资平台等途径提升产业集群的竞争力^③。周海燕(2010)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临港产业集群为例,论证了金融支持对产业集群形成的重要意义,提出应分阶段为产业集群制定与之适应的融资模式,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加大金融创新力度^④。中国人民银行课题组(2011)^⑤、李思霖(2012)^⑥通过对浙江、河南的产业集群金融支持状况的调查研究,提出应从转变观念、创新机制、组合产品、完善体系以及对集群企业提供差异化战略等方面入手,探讨了对产业集群发展提供金融支持的新路径。

1.2.3 关于“两型”社会建设的研究

1. “两型”社会、“两型”产业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在综合评价“两型”社会发展研究方面,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构建了综

① 卢亚娟,褚保金.区域产业集群发展的金融支持机制研究:案例分析[J].经济学动态,2011(4):92-95.

② 关里.区域金融发展视角下促进浙江产业集群升级的探讨[J].商场现代化,2009(15):134-135.

③ 阚景阳,张运鹏.产业集群金融支撑体系建设研究[J].经济与管理,2010,24(4):77-81.

④ 周海燕.金融支持促进广西临港产业集群发展的思考[J].区域金融研究,2010(12):55-58.

⑤ 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课题组.金融创新与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研究——以浙江为例[J].浙江金融,2011(05):9-16

⑥ 李思霖.河南产业集群发展与金融支持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2(4):12-13.

合评价指标体系。如“两型社会建设指标体系研究”课题组(2009)从体现“两型”社会建设特征出发,构造了经济、社会和制度3个要素、8个方面、61个三级指标的“两型”社会综合指标体系,并从指标标准的国际对比、前瞻性和统计推算3个方面说明了指标体系应用的原则^①。赵静等(2010)从环境与资源保护的视角,基于OECD推荐使用的PSR模型构建了包含13个环境主题、53个指标的“两型”社会建设环境指标体系,以期对环境政策制定提供信息支持,为综合评价计算模型的建立提供基础^②。朱海玲和施卓宏(2011)提出“绿色GDP”是衡量“两型”社会建设成效的有效工具,能够促使地方政府落实“两型”社会建设相关政策,并对“两型”社会建设中绿色GDP评价体系的建立与实施机制进行了研究^③。

游达明、马北玲等(2012)从资源节约度、环境友好度、经济结构、社会和谐度和科技创新力五个方面构建了一个评价“两型”社会水平的指标体系,并对武汉城市群和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的成效进行了评价^④。还有学者基于不同的数理方法提出了综合评价“两型”社会发展的模型,如层次分析法(瞿腾飞、胡苗苗,2009)^⑤、粗糙集模糊聚类法(叶文忠等,2011)^⑥、系统动力学建模(曹立军,杨中明,2012)等^⑦。

基于“两型”社会建设的背景,许多学者对“两型”产业的界定、发展与测度进行了研究。蔡景庆(2009)对“两型”产业进行了界定,并根据产业的“两型”程度把产业划分为核心层、中间层、外层和外围区四个层次,

① “两型社会建设指标体系研究”课题组,李正辉,任英华,姚莉媛,等.“两型社会”综合指标体系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9(3):114-117.

② 赵静,曹伊清,尹大强.“两型社会”建设环境指标体系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0(3):245-248.

③ 朱海玲,施卓宏.“两型社会”建设中绿色GDP评价体系的建立与实施机制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11(4):98-100.

④ 游达明,马北玲,胡小清.两型社会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基于中部地区两型社会建设的实证分析[J].科技进步与决策,2012,29(8):107-111.

⑤ 瞿腾飞,胡苗苗.“两型社会”视野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模型——基于武汉市的实证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9(6):18-26.

⑥ 叶文忠,欧婵娟,李林.基于粗糙集理论的“两型社会”发展评价[J].统计与决策,2011(11):34-37.

⑦ 曹立军,杨中明.基于系统动力学的两型社会评价与预测集成模型[J].系统工程,2012(2):61-67.

提出整治和禁止外围区、限制外层区、有序发展中间层区、重点发展核心区是“两型”产业的发展路径^①。陈晓红（2012，2013）应用超效率 DEA 分别对企业“两型”化、产业“两型”化发展效率进行度量，并从技术进步、产业结构、环境规制和开放程度等维度构建了产业“两型”化的影响因素分析模型^{②③}。

2. “两型”社会建设的金融支持

在国外，自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循环经济概念以来，这一强调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对金融业产生着深刻影响，其中以金融产品设计最为显著。根本原因在于，金融可以通过调剂资金余缺、积聚资金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并渗透到各个经济领域和层面，有效引导经济的转型与发展。英国于 1988 年率先推出第一只生态基金——Merlin 生态基金。由此可见，金融支持对以循环经济为理论前提的“两型”社会建设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和推动作用。

随着循环经济和“两型”社会理念的提出和相关研究的深入，国内学者对金融支持“两型”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关注也日益增多，在分析当前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诸多改进建议。2008 年以前的相关研究均以循环经济为对象探讨金融支持方式与途径。如，有学者提出循环经济体系的形成必须要充分发挥金融的杠杆作用，加大金融的总体支持，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建立高效的现代资本市场，大力发展环境金融，并从金融机构和制度层面构建相应激励机制（王卉彤，2006）^④；还可从提高金融体系资金供给能力和风险配置功能、推进金融制度建设等方面完善我国循环经济金融支持环境（张然斌

① 蔡景庆. 长株潭“两型产业”的路径优化 [J]. 重庆社会科学, 2009 (9): 55 - 58.

② 陈晓红, 陈石. 企业两型化发展效率度量及影响因素研究 [J]. 中国软科学, 2013, 04: 128 - 139.

③ 陈晓红, 程鑫. 产业两型化发展效率测算及影响因素——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J]. 系统工程, 2013, 13 (6): 100 - 107.

④ 王卉彤, 陈保启. 环境金融: 金融创新和循环经济的双赢路径 [J]. 上海金融, 2006, 06: 29 - 31.

等, 2006)①。此外, 创新的金融组织、金融评估体系、金融产品以及完善的金融产品结构对于循环经济发展与推动也至关重要 (庞任平, 2006)②。李杨、杨为官 (2006) 提出在循环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应施行不同的金融手段③。

自 2008 年开始, 国内学者将更多的关注集中于“两型”社会建设的金融支持研究。张强 (2008)④ 和周晓强 (2009)⑤ 都认为加强金融生态建设在发挥金融业推动“两型”社会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 前者对长株潭城市群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在经济基础、资金融通体系、信用环境、法制环境和体制环境等方面的优化进行了研究; 后者从实践的角度佐证了金融生态建设与区域经济增长间的必然联系, 结合分析当前长株潭城市群金融生态建设存在的关键性问题及成因, 针对如何切实优化区域金融生态提出了相关建议。赵勇、雷达 (2010) 研究认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降低增长方式转变的门槛值来推进经济发展向集约型转变⑥。封思贤等 (2011) 以长三角为例, 实证认为金融开放与增长方式转变之间相互促进, 应坚持金融开放以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⑦。付剑 (2014) 以山西省为例, 提出应从申请建立循环经济创业板市场、建设循环经济技术开发相关的风险投资机制、改善信贷模式等方面促进循环经济发展⑧。

部分学者以武汉城市圈为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梁志朋等 (2009)

① 张然斌, 欧阳强. 论构建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和谐金融环境 [J].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06 (08): 6-8.

② 庞任平. 建立发展循环经济的金融支持体系 [J].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06 (08): 42-43.

③ 李杨, 杨为官. 考虑金融因素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创新 [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 (3): 40-42.

④ 张强, 王忠生. 长株潭城市群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优化研究——基于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的思考 [J]. 求索, 2008 (7): 12-14.

⑤ 周晓强. 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金融生态环境问题研究 [J]. 湖南社会科学, 2009 (5): 12-14.

⑥ 赵勇, 雷达.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生差率促进抑或资本形成 [J]. 世界经济, 2010 (2): 37-50.

⑦ 封思贤, 李政军, 谢静.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金融支持——来自长三角的实证分析 [J]. 中国软科学, 2011 (5): 74-82.

⑧ 付剑. 山西省循环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构建 [J]. 经济问题, 2014 (4): 110-115.